



湖南人与辛亥革命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主编 饶怀民 范秋明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湖南人与辛亥革命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主编

饶怀民 范秋明

副主编

邓江祁 钟声 黄俊军 陶旅枫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湖南人与辛亥革命——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饶怀民, 范秋明主编.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 - 7 - 5648 - 0956 - 0

I. ①湖… II. ①饶… ②范… III. ①辛亥革命—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257.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2017 号

湖南人与辛亥革命——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主 编: 饶怀民 范秋明

◇组稿编辑: 刘苏华

◇责任编辑: 蒋旭东

◇责任校对: 王旭中

◇出版发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410081

电话/0731. 88853867 88872751 传真/0731. 88872636

网址/http: //press. hunnu. edu. cn

◇经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 长沙市宏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印张: 40

◇字数: 655 千字

◇版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648 - 0956 - 0

◇定价: 80.00 元

序 一

刘 晓

一百年前伟大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创建共和，是中国划时代的历史转折点。2011年10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全国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对辛亥革命作了崇高的评价。湖南省也隆重举行了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五大活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周铁农，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周强等省党、政、军领导出席并作了重要讲话，规格很高，意义重大，影响空前，反响强烈。

我们探讨湖南人与辛亥革命，就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三湘大地自古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在20世纪民族危亡、新旧鼎革的时期，英雄的三湘儿女奋勇担当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湖南，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策源地、舆论先锋队、许多领袖人物的诞生地、武装起义的主力军、武昌起义的首应之区，在辛亥革命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重要作用和重要影响，其功绩昭著日月、彪炳千秋！尤其是国内第一个反清革命组织华兴会，由黄兴领导在“辛亥革命策源地”长沙明德成立，开启了国内革命的先声。

我们探讨湖南人与辛亥革命，就要正确看待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孙中山曾经说过：“建设是革命的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设，即不必破坏，更不必言革命。”内忧外患、国家危亡，和平改良的道路走不通，慢慢来更来不及，才被迫以革命的方式救国救民。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革命是万不得已的事情，而且不能一直革下去。”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不能以所谓现代化史观，否定辛亥革命活动的正当性，把革命与现代化建设对立起来，进而否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我们要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动摇。

我们探讨湖南人与辛亥革命，就要高度重视青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青年是辛亥革命的主力军，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在民革省委编辑

的《湖南与辛亥革命》一书中收录了1000多个人物，参加辛亥革命时大部分都是风华正茂的青春年龄。这其中，有37岁的辛亥革命元勋黄兴、29岁的护国元勋蔡锷和国民党创始人宋教仁、26岁的武昌起义临时总指挥蒋翊武、24岁的湖南军政府都督焦达峰等大批仁人志士。他们以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勇气，用沸腾的热血和年轻的生命，谱写了中国历史上壮丽的一页。今天，真诚希望广大有志青年，继承和发扬爱国、革命和不断进步的精神和品质，为建设“四化两型”、“四个湖南”作出新的贡献！

我们探讨湖南人与辛亥革命，就要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逼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占了大片领土，勒索了巨额赔款，苦难的中国灾难深重。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救国救民、振兴中华，前赴后继，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艰苦求索，都没有完成。孙中山、黄兴领导的辛亥革命囿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也未能完全彻底。辛亥革命10年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以湖南人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孙中山先生未竟的革命事业，领导中国人民筚路蓝缕、开天辟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开展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新时期，我们又开创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今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并且开始强大起来了！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昂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可以聊以告慰辛亥革命的先烈们！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统一和振兴之路还很艰辛和曲折，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继续不断努力奋斗。我想，这也是我们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意义之所在。

为了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湖南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长沙市教育局、明德中学于2011年12月27~28日联合举办了湖南省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全国各地专家学者、辛亥后裔及各界人士共100余人参加了会议。经过与会人员的共同努力，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会后，湖南省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学术研讨会组委会组织编辑委员会成员，对会议收到的100余篇论文进行了认真的评审，精选其中50篇论文结集为《湖南人与辛亥革命》正式出版。我大致阅读这些论文后觉得，这些文章观点鲜明、资料翔实、论述具体，很有新意，将之付梓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编委会向我索序，我遂发表了以上观感，权充序言。

（刘晓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民革湖南省委主委）

序二

饶怀民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她不仅以吃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一个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长期以来，我们“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①，从而也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说，中国在古代并不落后！

自明代中叶以来，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去；然而，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以后，随着列强的频繁入侵，斩断了中国社会经济独立发展的道路，造成了中国社会性质的重大变化。早在1939年12月毛泽东曾经分析过这种变化，他指出：“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②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概括，系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和前途等问题，领导中国人民开展新民主主义革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3页。

^②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页。

命，并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而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抚今思昔，我们怎能忘记，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以来，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外国列强采用各种侵略手段包括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压迫手段，其中特别是军事压迫手段向中国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例如1840年英国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1857年英、法两国联合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4年法国发动的中法战争，1894年日本发动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的侵华战争等等，通过这一系列侵略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英、法等国签订了《北京条约》；中法战争后，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了《中法新约》；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八国联军入侵后，清政府与英国、美国、法国、日本、德国、沙皇俄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签订了《辛丑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外国侵略者攫取了各种特权，诸如海、陆军驻军权、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权、内河航运权、开办路矿及工业投资权，乃至传教、开放通商口岸、设立租界和划分势力范围等特权。详细考察上述不平等条约的内容，我们不难发现，《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加深，《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加深，《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最终形成。诚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①当然，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殖民地”有其特定的含义，系指“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更使已经变成半殖民地的中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0页。

国的一大块土地沦为日本的殖民地”^①。

按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再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毫无疑问，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性质”应当指的就是上述几种社会形态。而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既非封建社会，亦非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一种“半封建社会”。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中国近代社会是“半封建社会”，那么还有“一半”又何所指呢？据我个人的理解，另外“一半”应当系指“半资本主义社会”。当然，所谓的“半封建”、“半资本主义”也不是“一半对一半”、“半斤对八两”，二者并不具有“等值”的意义。“由于中国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之下，由于中国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状态，又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②近代中国各个地区的封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所占的比例也会存在很大差异。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气候温和，资源丰富，加之得海外风气之先，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所占的比例较大；中部地区自然条件优越，既有封建经济成分，也有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两种经济成分各占的比例相差无几；而西部地区或边远地区受各种条件制约，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所占的比例较小，有的地区封建经济可以说仍占统治地位，西藏某些地区甚至仍然处于奴隶制社会发展阶段。

尽管“殖民地”、“半殖民地”是指一个国家所处的社会地位而言，但是社会地位与社会性质又是不可分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某个时期，社会地位甚至可以决定社会性质；反过来说，社会性质又直接影响着社会地位，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日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之中，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更是如此。所以，毛泽东于1940年1月在分析中国社会的历史特点时进一步指出：“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0页。

^②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1页。

中国已经逐渐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在的中国，在日本占领区，是殖民地社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而不论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都是封建半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① 这一论断是完全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

面对外国列强的野蛮侵略和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为改变中国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境遇，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人们迅速作出回应，经过艰难的探索，他们提出了种种救国方案。以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提倡改革时弊，主张经世致用，讲求富国强兵之道，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增添了向西方学习的内容，成为著名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即经世派。魏源则率先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这是对传统华夷观念的勇敢突破！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以奕訢、张之洞、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继承了经世派的改革传统，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并大力开展洋务活动，从而大大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不论是经世派也好，也不论是洋务派也好，他们都主张在不触动封建统治基础的前提下，从科学技术层面上学习西方，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这是由地主阶级内部改革派发起的一场自救运动，他们的主观动机虽然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但在客观上却有抵御外侮的作用。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阶级发动和领导了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清朝最高统治者咸丰皇帝，这次起义坚持了14年之久，斗争烈火燃遍大江南北，以天京为根据地建立了农民政权，并提出了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为中心的社会改革方案——天朝田亩制度，将中国旧式农民起义推向了最高峰！在中国历史上，农民阶级虽然是起义的主力军，但由于农民阶级具有保守、散漫等局限性，他们不可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这种局限性反映在太平天国农民领袖身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他们在发动起义时找不到先进的思想武器，提不出科学的政治纲领。二是农民领袖虽然反封建，但不可能将封建作为一种制度来反，他们只是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5页。

反对“坏皇帝”，拥护“好皇帝”，他们自己甚至也想当皇帝，他们本身就是皇权主义者。三是他们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不能自觉地抵制封建思想意识的侵蚀，当起义取得某些局部胜利时，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居功骄傲、享乐腐化的思想，容易腐败。所以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最终还是悲壮地失败了。正如毛泽东在分析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时所指出的，这主要“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①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以农民为主的下层劳动群众反洋教斗争又如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并最终形成高潮，这便是义和团运动。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是什么性质呢？我个人认为，义和团运动既不同于以往的农民起义，因而不能称为旧式农民起义；也不同于历次民族战争，因而也不能称为一般的民族战争。义和团运动是民族矛盾尖锐化的产物，是反洋教斗争的顶点，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劳动群众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其反帝爱国的性质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但义和团运动在斗争达到高潮时却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虽然它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也提出过“反清灭洋”、“扫清灭洋”等口号，但分析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就要把握斗争高潮时的主要口号。当然，义和团运动在打击帝国主义者的同时，也打击了封建统治者；但从“扶清灭洋”这一斗争高潮时的主要口号来分析，它主观上并不具备反封建斗争的意义。它最终被清政府所利用，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下，仍然免不了失败的命运。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逐步形成，并跃登政治舞台，开始其政治运动。民族资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5页。

产阶级上层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发动了戊戌维新运动，这场运动旨在依靠光绪皇帝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以期建立君主立宪的社会，达到救亡图存、保国保种的目的。戊戌维新运动虽然是一次具有爱国性质的进步运动，但在以西太后为代表的顽固势力的血腥镇压下，最后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血洒北京菜市口而归于流产。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证明，当时要救中国走改良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于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以孙中山、黄兴为轴心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孙中山将其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统称“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内容非常丰富，集中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政治要求，那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因此，毛泽东曾经指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①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伟大事件，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辛亥革命未能彻底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和性质，但是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却是不容抹煞的，其历史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辛亥革命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赶下了政治舞台，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从而也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此后任何复辟帝制的阴谋再也不能得逞了。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各国支持的清政府，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外国侵略者的统治根基，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分子。它向世界人民表明，中国的命运是由中国人自己掌握的，而决不是由帝国主义者所能任意支配的。此后，任何以帝国主义为靠山的反动势力不论其具有多么强大的武力，也不论其受何种外国势力所指使，最终都将不可避免地由于人民的反对而遭到可耻的失败。辛亥革命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整个亚洲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它大大削弱了帝国主义者在这个地区的殖民统治。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7页。

辛亥革命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特别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推行了一系列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法令，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推动和加速了中国近代化进程。

辛亥革命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既然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可以被推翻，过去被人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反动或者落后的东西不可侵犯、不可改造呢？这就为中国的进步潮流打开了闸门，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斗志，激励人们继续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斗争。

辛亥革命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开端，为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它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近代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自己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视为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诚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①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经过20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终于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近代以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和中国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开辟了中华民族发展和进步的历史新纪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开展了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大会确定以经济建设为重点，实行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奋斗，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现在，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各族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满怀豪情地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孙中山“振兴中华”的伟

^① 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页。

大理想，辛亥革命先驱的美好憧憬，今天已经或者正在成为现实，这是我们可以告慰先贤于九泉的。

正是因为辛亥革命的意义重大，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辛亥革命的纪念活动和学术研究。从1981年开始，按照惯例，每逢十年，在北京都要举行一次规模宏大的纪念活动；在“首义之区”的湖北武汉都要举行一次大型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首应之区”的湖南长沙都要举行一次较大规模的青年学术讨论会。

忆昔198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日到来的时候，首都各界人士10000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时任党中央主席胡耀邦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发表《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社论。中国史学会和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于10月12日至15日在武昌东湖宾馆联合举办了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由中华书局出版了《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中、下三册）。该论文集收入论文107篇，其中国内学者81篇，国外和香港学者26篇。接着，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和湖南省历史学会于12月5日至9日在湖南长沙联合举办了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会后由中华书局出版了《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下两册）。

1991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80周年纪念日，首都各界人士5000多人在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纪念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发表《继往开来，振兴中华》的社论。中国史学会和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于10月15日至19日在武昌东湖宾馆联合举办了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由中华书局出版了《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下两册），收入论文101篇，其中中国内地学者论文76篇，台湾地区学者论文3篇，香港地区学者论文5篇，日本、美国、德国、韩国等国学者论文17篇。此前，湖南省历史学会、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会同湖南省政协、民革湖南省委员会、湖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师范大学、湘潭大学、中南工业

大学、湘潭师范学院、长沙市政协（排名不分先后）等单位于10月8日至14日在长沙联合举办了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会后由湖南出版社出版了《辛亥革命新论》（即此次会议论文集）。

2001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90周年纪念日，首都各界人士6000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发表《发扬辛亥精神，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社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史学会、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于10月16日至19日在武昌东湖宾馆联合举办了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辛亥革命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上、中、下三册）（即此次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收入论文102篇，其中中国内地学者65篇，中国港澳台地区学者14篇，外国学者20篇，旅日、旅美中国学者3篇。此前，由湖南省政协、中国史学会牵头，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民革湖南省委员会、长沙市政协、湖南省教育厅、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历史学会、湖南师范大学、湘潭大学、湘潭师范学院、吉首大学、衡阳师范学院、零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怀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排名不分先后）等单位于10月11日至14日在长沙联合举办了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会后由岳麓书社出版了《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社会——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2011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日，首都各界人士3000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发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的社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由中国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承办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0月11日至15日在武昌东湖宾馆举行，此次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正在编辑之中；此前，由湖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湖南师范大学、湖南省辛亥

革命史研究会（排名不分先后）等单位于 10 月 9 日至 11 日在长沙联合举办了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此次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亦在编辑之中，这两本论文集可望在 2013 年正式出版。

我有幸应邀参加了在武昌举办的 70 周年、80 周年、90 周年、100 周年 4 次国际学术讨论会。虽然由于受年龄限制，我无缘参加上述四次青年学术讨论会；但我还是有幸参与筹备和组织在长沙召开的 90 周年和 100 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通过参加上述学术会议，感慨良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感受：

一是各级领导对辛亥革命学术会议非常重视。在武昌举办的 4 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湖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均亲自出席会议的开幕式，在大会上致欢迎词，开幕式议程中还有一项议程就是领导和全体与会学者合影留念。我至今仍保留着在武汉召开的 4 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合影。武昌东湖宾馆是接待中央首长的地方，此处有茂林修竹，风景十分秀丽，号称“武汉的中南海”，上述 4 次国际学术讨论会选择在这里召开，可见湖北省委领导的重视程度；而且，会议经费由政府拨款，逐次增多，服务工作十分到位。

二是国内外学者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兴趣有增无减。按照上述 4 次国际学术会议的要求，出席会议的国内学者采取论文评选的方式确定，评审通过者方可参加会议，用以提高参会学者论文的质量。尽管如此，但提交会议的论文数量越来越多，因而会议的规模越开越大。1981 年参加纪念辛亥革命 7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国内学者还只有 100 余人，而参加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国内外学者已经达到 200 多人。学者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兴趣浓厚不仅体现在有关辛亥革命学术会议的规模越来越大，而且还体现在学术会议的次数越来越多。“文革”之前，辛亥革命的大型学术讨论会仅开过一次，那就是 1961 年 10 月 16 日至 21 日在汉口德明饭店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 50 周年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是中国史学会和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共同举办的；会后由中华书局出版了《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上、下两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纪念辛亥革命 60 周年学术讨论会未能如期举行。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学术研究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辛亥革命的学术讨论会包括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组织召开的有关辛亥革命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及革命团体在内的学术讨论会一个接着一个地召开，使人目不暇接。例如纪念某一个辛亥人物诞辰多少周年或逝世多少周年、纪念某一个历史事件发生多少周年、纪念某一个革命团体创办多少周年等均可以作为学术讨论会的主题。据不完全统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上万人次参加过有关辛亥革命的各种学术会议，提交论文数千篇，开会地点遍及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广州、重庆、长沙、杭州、昆明等30多个城市。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不仅引起国内学者的浓厚兴趣，而且对各国学者也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外国学者除在本国组织有关辛亥革命的学术会议、邀请中国学者参加外，只要条件许可，总有不少外国学者赶来参加我国学者在各地举办的有关辛亥革命的国际学术盛会，这已成为一种学术惯例。总之，有关辛亥革命学术会议的频繁召开，大大推动了辛亥革命史的研究。

三是有关辛亥革命的学术讨论会各具特色，内容越来越丰富。一般来说，每次学术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虽然只是围绕一个主题，但在讨论中涉及面却很宽广。例如1981年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虽以“资产阶级研究”为主题，但内容却囊括了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历史人物的评价等问题。2001年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虽以“辛亥革命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为主题，但内容涉及辛亥革命时期的政局、政治集团、经济发展与商界活动、思想与文化、国家与社会、孙中山及相关人物、辛亥革命运动与起义、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的认同、辛亥革命涉外问题与国际社会、辛亥革命学术史研究等10多个问题。可以说，每次会议都有区别于其他会议的特点，在武汉召开的4次国际学术会议虽以前辈学者占多数，但讨论的内容并非“老生常谈”，而是从理论的高度进行探索，提出新的见解，给后生以启迪；在长沙召开的4次青年学术会议，也充分体现了年轻人的特点，其讨论的内容则充分体现出勇闯禁区、敢填空缺，想前人所未想、发前人所未发，真可谓“后生可畏”。其他各省、市自治区举办的有关辛亥革命的历史人

物和事件的学术讨论会，其主要内容大多联系本省辛亥革命的具体实际进行讨论，挖掘出大量第一手资料，体现出浓厚的地方色彩和馥郁的乡土气息，大大丰富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内容。

四是青年学者参加辛亥革命学术会议的积极性越来越高。我还清楚地记得，1981年参加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学者中，前辈学者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中云南大学的本科生唐克敏26岁，是与会学者中最年轻的。我的硕士班同学赵军28岁，成为记者竞相采访的新闻人物，一篇报道称其为“史坛新秀”。参加此次学术盛会的学者中，40岁以下者屈指可数，包括我们几位刚刚毕业的硕士生在内也不过10余人。但参加2011年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学者中，青年学者的比例明显上升，40岁以下的年轻人可以说指不胜屈，成为此次学术盛会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我所带的辛亥革命史方向的研究生中就有3位青年学者名列其中^①。参加此次学术会议的年轻博士亦不少。按照过去在长沙召开的4次青年学术会议不成文的规定，凡40岁以下学者提交给会议的论文经过组织专家评审通过者方可参加。但青年学者提交会议的论文一次比一次多，参加人数也一次比一次多，因而收入论文集的论文也一次比一次多。仅以收入论文集的论文为例，据统计：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仅收入论文19篇，80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收入论文40篇，90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收入论文73篇，100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收入论文可能还会更多。现在，这些当年参加过青年学术会议的学者活跃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已经成为高等院校或科研单位的重要骨干，其中有的学者还有相当高的知名度。这使我深切地感到，辛亥革命史研究后继有人，我国青年一代史学工作者正在茁壮成长、是大有希望的。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也是大有可为的。

湖南是辛亥革命重要的策源地之一，也是最早响应湖北首义的“首应之区”，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如国内率先发动的长沙起义，引领长江流域革命的鄂、宁起义，震惊中外的萍浏醴起义，民族资产阶级上层领导的

^① 这三位青年学者分别是中山大学的赵立彬、烟台大学的李日、南开大学的郝幸艳。